

第2课 “贞观之治”与“开元盛世”

内容标准

知道唐太宗和“贞观之治”，知道唐玄宗和“开元盛世”，初步认识唐朝兴盛的原因。

一、教学立意

通过解读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，初步认识唐朝走向兴盛的原因。

二、教学目标

知道唐太宗李世民的主要政绩和“贞观之治”的主要内容。知道唐玄宗李隆基的主要政绩和“开元盛世”的表现。了解唐太宗和唐玄宗的历史活动，学会全面、客观地分析、评价历史人物。说明杰出历史人物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通过学习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，理解要保证社会持续稳定发展，关键在于保持较好治国理政政策的连续性。

三、教材分析

1. 内容主旨

唐朝经“贞观之治”的积累，达到“开元盛世”的局面。

2. 主旨诠释

“贞观之治”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。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百废待兴。君臣吸取隋暴政而亡的教训，重视“君民”关系，纠正前朝弊端，居安思危，调整统治政策。太宗知人善任、虚心纳谏，开清明之风。由此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社会秩序趋于安定，经济恢复发展。基于“贞观之治”与武周时期的百年积累，唐玄宗李隆基在继承唐太宗基本国策的同时，励精图治、锐意改革，唐王朝呈现出政治清明、社会安定、经济繁荣的“开元盛世”。

3. 要点分析

本课由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两目组成。唐初的“贞观之治”为中期“开元盛世”的到来奠定了深厚的基础。

第一目叙述了“贞观之治”的背景和主要内容。“富强”的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的震动是非常大的。从隋朝的瓦解中（隋末农民大起义）贞观君臣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，关注“君民”关系，

体悟到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”的道理,强调以民为本,纠正前朝弊政,推行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政策。社会日益稳定,经济恢复发展。在执政方面,除继续完善隋朝的优秀创制(三省六部制、科举制)外,唐太宗居安思危,集思广益、择善而从以求长治久安。他招贤纳士,重视德才兼备之士,又不拘一格,尤其善于纳谏,使朝野上下形成敢于直谏的风气。但随着政局的安定,唐太宗晚年骄傲自满,耽于享受,不再虚心纳谏,只听顺耳之言,群臣因之明哲保身、唯唯诺诺,直谏之风逐渐消失。总体而言,“贞观之治”使唐初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,为唐中期“开元盛世”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第二目聚焦“开元盛世”。唐玄宗李隆基即位,结束了唐宗室争权的混乱局面。他继承唐太宗时期的基本国策,励精图治、锐意革新。在政治上,改革吏治,任用姚崇、宋璟等贤臣,鼓励直谏,使得朝廷充满朝气,恢复了朝政清明宽容的贞观之风。同时,重视法治,废止严刑峻法,实行宽松简约、审慎处罚的法律原则。经济上,以农为本,重视生产,清查户口,减免徭役,缓解了社会矛盾。由此,天下大治,国力富强。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“开元盛世”。

四、教学重点与难点

1. 重点

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的主要内容。

2. 难点

如何认识唐朝兴盛的原因。如何全面、客观地评价唐太宗和唐玄宗的统治业绩和历史地位。

五、教学设计建议

设计一：讲述法

导入新课

接上课,回顾隋朝灭亡的原因,讲述唐朝初建时百废待兴的局面和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。

1. “贞观之治”

分析“贞观之治”的背景:唐初百废待兴的时局下,君臣吸取隋亡教训,改弦更张,另谋新政。唐太宗居安思危,注意君民关系,实行休养生息、轻徭薄赋等简政安民的措施,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,经济恢复发展。

介绍唐初统治者的两大特点:一为知人善用。用人不计资历、不论亲疏,凡是有治国安邦之才者都委以重任(可举具体事例说明,如收罗人才的例子有房玄龄、杜如晦,不计前嫌的例子有魏徵,不嫌寒微的例子有马周等)。二为虚心纳谏。唐初,因太宗善于纳谏,朝野上下形成了敢于直谏的风气,这是贞观政治的一大特色(可讲述相关小故事)。另需注意,唐太宗的纳谏并非一以贯之的,晚期他安于功绩有所懈怠。可以看到,在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下,皇帝个人的作为对整个朝局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
总结评价:“贞观之治”为“开元盛世”的到来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

2. “开元盛世”

分析“开元盛世”的背景：唐玄宗李隆基即位，结束唐宗室多年夺权内斗，稳定了政治局面。在百年积累的基础上，他继承唐太宗的基本国策，励精图治、锐意改革，恢复贞观政治之风。唐王朝出现了“开元盛世”。

引导学生梳理玄宗理政的内容：政治上，革除弊端，抑制腐化，精简机构，裁减冗官，提高行政效率，重用贤臣，鼓励直言进谏。经济上，重视生产，清查户籍，减免徭役，努力缓解社会矛盾。此外，他还废止严刑酷法，实行宽松简约、审慎处罚的法制原则。

总结评价：“开元盛世”将唐王朝统治推向全盛。但在全盛中也隐伏着危机。开元后期由于长期升平殷富，玄宗志得意满，日益骄奢，开始怠于政事、纵情声色、信用小人，在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唐朝由盛转衰。

小结

唐朝经历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，呈现出政治清平、社会安定、经济高度繁荣的景象，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黄金时期。

附：板书设计

第2课 “贞观之治”与“开元盛世”

	“贞观之治”	“开元盛世”
人物	唐太宗李世民	唐玄宗李隆基
特点	吸取教训、改弦更张 广纳人才、虚心纳谏	继承前政、恢复清风 励精图治、锐意革新
效果	社会安定、经济恢复 积累财富、走向辉煌	政治清平、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、达到全盛

设计二：讨论法

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。可让学生在课前查阅、收集两位皇帝的历史活动和著名事迹。唐太宗和唐玄宗在执政前期都是有为的皇帝，因此才创造出了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的辉煌，但在后期他们也都出现了失误。尤其是唐玄宗后期，甚至爆发了“安史之乱”，唐朝由盛转衰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如何全面、客观地评价两位皇帝？可由学生主讲，在老师的引导下展开讨论，以史为鉴，总结得失。

六、习题分析

1. 课外学史

“载舟”的例子：如西汉“文景之治”。文帝、景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，使社会安稳、经济发展，为汉武帝时期的极盛奠定了基础。

“覆舟”的例子：如秦统治无道，法律严酷，劳役苛重，激起陈胜、吴广起义，强大的秦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很快灭亡。东汉末年政治混乱，朝纲不正，东汉王朝在黄巾军起义的打击下土崩

瓦解。隋朝也重蹈虐民暴敛的覆辙,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崩溃。

2. 知识整理

	文治	武功	缺失	影响
秦始皇	建立、巩固中央集权体制	灭六国、南征百越、北击匈奴	严刑峻法、焚书坑儒、竭泽而渔	构建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蓝本
汉武帝	巩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	三次反击匈奴	好大喜功、滥用民力	西汉全盛
唐太宗	知人善任、虚心纳谏、居安思危	反隋建唐、平定边患	晚年懈怠	“贞观之治”

表格设置及内容供教师参考。教师可结合时代背景,考虑历史人物处境,多角度地分析历史人物的具体活动,引导学生尽量全面、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。

3. 思考与讨论

关于创业与守成的难易问题是一道开放性的讨论题,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思考和讨论明白两者都不是易事,尤其是看似较为容易的“守成”,在某些历史时期可能较创业而言更为困难。总之,两者的难易会根据具体的时间或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,不能固持一说。在讨论这个问题时,可让学生自由发挥,教师需在课前参考更多资料以便能够根据课堂情况引导学生。

七、 课文注释

1. 唐太宗李世民

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。李世民生于一个军事贵族家庭,从小就喜爱演习弓马,武艺娴熟。除了操练兵器外,李世民还喜读兵书,常读的有曹操注的《孙子兵法》,能背诵如流,年纪尚轻就显露出军事才能。

隋朝末年,农民起义如火如荼,北方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,北边突厥乘机进犯,炀帝派李渊将兵出击,结果吃了败仗,他很担心炀帝问罪,内心忐忑不安。李世民察觉了父亲的心病,便劝他说:如今主上无道,百姓穷困,大人如只守小节,下有寇盗,上有严刑,实在太危险了。不如顺民心,兴义兵,转祸为福,这正是老天赐予咱们的好机会啊!此后一连数日,李世民再三劝说父亲起兵反隋,李渊最后终于听从了儿子的建议,他叹息着说:我想了一夜,觉得你说得有理,如今破家亡国也由你,化家为国也由你了!

大业十三年(617年),李渊父子于晋阳起兵,并向关中进军。李世民统军作战,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唐军攻占长安后,李世民为京兆尹,封秦国公。武德元年(618年),李渊称帝后,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、进封秦王。武德二年(619年),李世民率军击败陇右割据势力薛举、薛仁果父子后,又领军进讨已占据河东地区的刘武周。武德三年(620年),为收复河东之地(黄河以东),李世民率军与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所率部队相持三个多月后,宋军终因粮尽兵乏,连夜逃遁。李

世民立即下令全速追击,不给敌军以喘息的时间,最后在一个叫雀鼠谷的地方追上了宋军,一天之内与之交战八次,唐军大获全胜。这时,李世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、三天没有解甲了。当夜,军队在雀鼠谷驻宿,李世民与将士们宰杀了军中仅剩的一只羊,大家分而食之。至武德四年(621年),李世民又消灭了河北的窦建德和洛阳的王世充两支武装势力,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。

自晋阳起兵到统一全国的战争中,李世民身经百战,威望日盛,不但掌握着大量的军队,而且还身兼丞相之职。这便引起了太子李建成的不满,李渊诸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日趋激化。太子府中的官员王珪、魏徵都提醒太子“秦王功盖天下,中外归心;殿下但以年长居东宫,无大功以镇海内”,建议太子早做准备。而秦王也不断搜罗人才,他开馆罗致了诸多文学之士,如杜如晦、房玄龄、虞世南、孔颖达等,又先后得名将秦叔宝、程知节、罗艺、尉迟敬德等,手下文武人才具备,形成了一个以秦王为核心的政治集团。于是,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一方,与以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为首的另一方,各自外结朝臣,内贿妃嫔,展开皇位继承人的争夺斗争。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联合,多次谋害李世民,然而未能得手。李世民与杜如晦、房玄龄及诸将谋商,决定先发制人。武德九年(626年)六月四日,李世民率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等兵将埋伏于玄武门。李建成、李元吉行至临湖殿时,发觉玄武门有伏兵,立即掉转马头逃跑。李世民骑马迎面而来,李元吉仓皇张弓,连射三箭皆不中。李世民取弓还射,李建成当即中箭而死,李元吉中流矢夺马欲逃,被尉迟敬德所杀。争夺皇位的斗争以李建成、李元吉之死告终,史称“玄武门之变”。事后,尉迟敬德入宫请高祖手敕,命李世民事制诸军,高祖只得允诺,又立李世民为皇太子。不久,高祖被迫禅位,称太上皇,李世民即位,是为唐太宗。次年改元贞观。

2. 唐初君臣讨论隋亡的教训

隋王朝本是一个很富强的统一王朝,其储备的粮食可供50年之用,却二世而亡。隋朝的结局对唐初君臣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警告,贞观前期,君臣们经常思考讨论的问题就是:如何才能不重蹈覆辙,不走隋炀帝的老路。唐太宗认为,隋朝败亡的原因有三:一是炀帝“广治宫室,以肆行幸”,所造的行宫别馆“相望道次,遍布各地”。二是“美女珍玩,征求无已”。唐军初平长安时,太宗曾见宫中的“美女珍玩,无院不满”,可见隋炀帝的挥霍奢侈,荒淫无度。三是“东西征讨,穷兵黩武”。总之,徭役无时,干戈不停,致使百姓无法生活,奋起反抗,结果是“身戮国灭”,为后人所笑。

从隋亡的历史教训出发,唐初君臣对“君”与“民”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,唐太宗曾对臣下说:《尚书》说,可爱的不是国君吗?可畏的不是百姓吗?做国君的如果有道,百姓就拥戴他为国君;如果他无道,百姓就抛弃不用他。这实在可怕啊!魏徵也回答说:君王是舟,百姓是水,水能承载船只,水也能淹没船只。唐太宗又对臣下说:为君之道,必须先存百姓,若损百姓以奉自身,这就好比割股以啖腹,腹饱而身毙。贞观二年(628年)四月的一天,唐太宗在朝廷上对臣下说:我读隋炀帝的诗文,他的文辞华丽而深奥,他也知道当以尧、舜为榜样,不当效法桀、纣,可是行动上为什么却相反呢?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:炀帝骄傲自满,刚愎自用,嘴上说的是尧、舜的话,实际做的却是桀、纣的事,如此言行不一,当然自取灭亡。唐太宗听了连连点头说:前事不远,这正

是我的老师啊！通过对隋朝历史教训的总结，唐太宗君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治国思想，即偃武修文、戒奢从简和轻徭薄赋。

所谓偃武修文，就是及时结束军事征战，实行文治，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的政治建设和经济恢复方面。戒奢从简，就是崇尚节俭，去除奢华，不大兴土木。轻徭薄赋，就是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，与民休养生息，使社会经济逐步恢复。太宗曾一再说自己：“不敢轻用民力，惟令百姓安静，不有怨叛。”“夙夜孜孜，惟欲清静，使天下无事。”魏徵等大臣也多次进言说：“静之则安，动之则乱。”“帝王为政，皆志尚清静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”贞观七年（633年）二月，唐太宗外出巡视，路过蒲州，蒲州刺史赵元楷为了讨好皇帝，命令城中的老百姓穿着黄纱单衣，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恭迎圣驾。他还事先派人将城里的楼堂馆舍整修一新，又准备了数百头肥羊、数千尾大鱼，用来款待随行的官员。原来赵元楷在隋末任江都郡丞，隋炀帝游江都时，他四处搜刮，以供炀帝及其随行官员挥霍。唐建立后，太宗不念旧恶，留任其为蒲州刺史，可他旧习不改。唐太宗知道后把赵元楷找来，责备他说：我外出巡视，一路上所需要的东西，都由宫中内库供给。你现在做的，正是那些使隋朝灭亡的弊政啊！看见隋朝的短命而亡，不要重蹈隋炀帝的覆辙，这正是唐太宗君臣在贞观初期刻骨铭心、时时记取的历史教训。

3. 魏徵

魏徵（580—643年），字玄成，河北钜鹿曲城（今河北巨鹿西北）人。魏徵少年时由于父亲去世，家道中落，一度出家为道士。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以后，曾在李密属下任职，后随李密降唐，一度又为窦建德所俘，窦氏败亡后，再次归唐。后魏徵为太子李建成所赏识，被荐任太子洗马，成为太子东宫的座上宾，曾劝太子早图计谋除李世民。玄武门之变后，魏徵被擒，太宗气愤地问他：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？魏徵毫不畏惧地说：太子若早听我的话，也不会有今日下场。太宗见他临危不惧，又深知他的才干和为人，便任他为谏议大夫。魏徵见太宗欲当明君，以知遇之恩，尽心竭力，坦荡直言，每见太宗行为有差错，总是毫不留情地直言君过。长此以往，太宗对魏徵甚至有了几分惧怕。一次，太宗想去南山游猎，正要起驾，闻魏徵从家乡扫墓回来，马上传旨，大驾停发。事后，魏徵问太宗取消南山游猎的原因，太宗说：因怕你责问，所以就中途作罢了。太宗喜欢玩鸟，曾得到一只打猎用的鹞鹰，爱不释手。一天，太宗正把鹞鹰放在臂上玩耍，内侍入报，说魏徵求见。太宗生怕魏徵又要批评他荒误朝政，便下意识地吧鹞鹰藏入怀中。魏徵奏事许久不停，太宗心中焦躁万分，又不便发作，只得听他讲完。等魏徵告辞后，太宗急忙从怀中掏出鹞鹰，只见它早已被闷死。

魏徵心直口快，敢犯龙颜，且坚持原则，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。贞观初年，宰相封德彝因兵源不足，向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（唐初16岁为中）之体格健壮者简点入军，太宗表示同意。诏令由中书省起草后，送门下省审议时，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魏徵拒不签发，文书来回三四次，魏徵仍然拒绝。太宗得知后非常生气，立即派人召来魏徵，声色俱厉地说：简点中男入军一事，我已经同意了。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什么干系，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，我真不明白你这是有什么用意！魏徵严肃地说：我听说，竭泽而渔，并不是打不到鱼，而是明年无鱼；焚林而猎，不是得

不到兽,而是明年无兽。如果将中男都简点入军,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徭役,将从哪里去收呢?陛下常说,我当国君,以诚恳信义待人,想使官吏、百姓都没有矫诈虚伪之心。但自陛下即位以来,大的事情才处理了三两件,就开始不讲信义,长此以往,怎能取信于民呢?接着便一连列举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几件事。太宗听了以后,沉吟半晌,终于认识自己的错误,下令停止简点中男入军。魏徵正直而有主见,他自称要做“良臣”,而不是“忠臣”,忠臣只是要对君主忠心不二,良臣则要匡正君主的过失,希望国家得到治理。由此,他把个人的声名置于脑后,常常甘冒众怒,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也因为如此,魏徵深得太宗器重。太宗常自比玉石金矿,称魏徵为良工巧匠。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,贞观一朝谏臣云集,著名的有魏徵、虞世南、王珪、刘洎、岑文本、褚遂良、马周等人,其中以魏徵最为杰出。他前后所奏二百余事,大部分保留在《魏郑公谏录》和《贞观政要》两书中。其中,《再论时政疏》(即《谏太宗十思疏》)和《十渐不克终疏》(简称《十渐疏》)是他一生奏疏中最为重要者。魏徵所谏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,使太宗少犯很多错误,对“贞观之治”的出现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魏徵的祖父魏彦,在北魏时曾欲删削各家《晋书》,成一家之言,未成。其父魏长贤,是著名史学家魏收的族叔,博涉经史,北齐时为著作佐郎,曾欲承魏彦之志,改撰《晋书》,后因讥刺时政,出为上党屯留令,其志未遂。魏徵以家学渊源,亦略有纂述。唐贞观中修梁、陈、北齐、北周和隋五代史,魏徵总领其事,其中《隋书》由他主要负责,并亲自撰写序论。此外,他还主编《自古诸侯王善恶录》,并为萧德言等所辑《群书治要》一书作序。

贞观十六年(642年),魏徵染病卧床不起,次年正月,病情恶化,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望,并面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魏徵之子魏叔玉。正月十七日,魏徵病卒,时年64岁。遗物中有一份没有写完的疏:天下事有善有恶。任用好人,国家就安全;任用坏人,国家就衰败。如果能了解自己喜欢的人的缺点,又能了解自己讨厌的人的优点,毫不迟疑地去掉邪恶的人,那么,国家就能兴盛起来……魏徵死后陪葬昭陵,太宗亲自撰写并笔书碑文。又对近臣说:人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,以古为镜,可以见兴替,以人为镜,可以知得失。魏徵死了,朕痛失一镜啊!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引起他人的妒忌,或指摘魏徵私结朋党,或诬陷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,太宗信以为真,遂导致对魏徵的不满,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,又下令推倒亲自书写的纪念碑。贞观十九年(645年),太宗亲征高丽,大败而归。他深悔不该出兵,叹息说:若魏徵在,一定不让我进行这一次战争。于是,派人重立了纪念碑。

4. 唐太宗的用人

唐太宗取得“贞观之治”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他选贤任能,不拘一格。唐太宗深知“为政之要,惟在得人”,即位以后,以古代帝王中少有的胸怀和气魄,少有的卓越识见和胆略,选择、提拔和破格录用各种人才来为李唐王朝服务。他用人不计资历地望,不计亲疏恩怨,凡有治国安邦之才者,都委以重任。他曾说:“以天下之广,岂可独断一人之虑?朕方选天下之才,为天下之务,委任责成,各尽其用。”

贞观元年(627年),唐太宗要求右仆射封德彝举贤,但封氏一直没能有所荐举,问其原因,封

氏回答说,不是他不尽心,而是“于今未有奇才耳”。唐太宗便对他说:君子用人如用器,各取所长,关键在于你能否发现人才,“安可诬一世之人”。贞观三年(629年),唐太宗要求臣下不拘一格、广求贤人,又命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。中郎将常何奏疏二十条,见解独到,论述精辟。太宗阅后甚为纳闷,常何是一介武夫,怎么写得这么高明的奏章。召来一问,原来是门客马周代笔。马周原是一名孤贫落魄的书生,家境穷苦,很不得志,初到长安,即遭所宿客栈店主的冷遇,后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当门客。太宗得知后非常高兴,急召马周进宫,但马周性格倔强,竟不肯应召。太宗求贤心切,接连四次派人去请。及见面交谈,太宗深爱其才,授官监察御史,后马周成为贞观中后期的枢要大臣。在太宗的大臣中,像这样出身贫寒而被委以重任的人才,除了马周外,还有戴胄、杜正伦、张玄素、岑文本、崔仁师等。对于前朝旧臣,甚至敌人宿仇,太宗也是不拘私情,大胆提拔。如魏徵,早先为太子洗马时,见太宗与太子暗中倾轧争夺皇位,常劝太子早做准备。太子败亡以后,太宗不计私仇,提拔魏徵为谏议大夫,魏徵深得太宗的信任。太宗曾对魏徵说:你的罪比射中齐桓公带钩的管仲还大,我对你的信任超过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,近代以来君臣之间的融洽相处,难道有像我和你这样的吗?贞观六年(632年),太宗在九成宫设宴款待近臣,长孙无忌说:魏徵等当年侍奉太子,我见了他们就像见到了仇人,想不到今天又在一起参加宴会。太宗说:魏徵过去的确是我的仇人,但他尽心于自己所侍奉的人,这一点值得称道。我提拔和重用他,是因为他敢于直率地净谏,常常不使我做错事,所以我才器重他。魏徵听了忙拜谢说:陛下引导我劝谏,所以我才敢直谏;如果陛下不能接受我的意见,我又怎敢去冒犯龙颜,触及忌讳呢?像魏徵那样来自敌方的,还有尉迟敬德、李绩、秦叔宝、程知节等,他们都是贞观年间重要的文武贤才。还有一些奸佞之人,只因有才能,唐太宗也加以任用。如隋朝的民部侍郎裴矩,是个有名的奸佞之臣,降唐之后,官任殿中侍御史。太宗即位初年,痛恨官吏贪赃枉法,便设计“试略”。有一小官中计,受绢一匹,太宗立刻下令将其处死。裴矩极力谏阻,认为官吏受贿罪实当杀,但皇上故设圈套,却是“陷人以法”。太宗听了很高兴,当即表扬裴矩“能当官力争,不为面从”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记载这一件史事时,很有感触地说:裴矩“佞于隋而忠于唐”,原因还在君主身上,“君恶闻其过,则忠化为佞;君乐闻直言,则佞化为忠”。所以史家称赞唐太宗“拔人物则不私于党,负志业则咸尽其才”(《旧唐书·太宗纪》),并非全是溢美之词。

贞观十四年(640年),魏徵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,把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比作人的首脑与四肢的关系,他说:国君是人的首脑,臣下是人的四肢,首脑与四肢协调同心,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。肢体如有不全,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首脑虽然处于至尊重要的位置,却必须借助四肢才能成为整体。国君虽然明察通晓,也一定要借助臣下的辅助才能把国家治理好。太宗深以为然。他不仅广罗人才,而且还能知人善任,使他们各得其所,充分发挥才能。唐太宗在选择、提拔和录用人才方面的成功,使得他周围聚集着一大批贤相能臣,他们都是唐太宗治国安邦的智囊人物,唐初君臣相辅相成,最终促成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实现。

5. 唐太宗的纳谏

贞观初年,有人建议皇帝独揽大权,一切由君王专断。但唐太宗认为,要使国家达到治,唯有

“君臣上下,各尽至公,共相切磋”,隋代君主的那种独断专行的做法是行不通的。他曾对大臣萧瑀说:我自小爱好弓矢,自以为能尽得其中奥妙。有一次,我将所得的十几把良弓交由工匠欣赏评判,他们说这些弓所用的材料不好,木心不直,脉理歪斜,弓虽刚劲而发矢不直,都算不上是良弓。我以弓箭打天下,用过的弓不知有多少,而仍不能尽得这其中的道理,天下之事又哪能尽知呢?贞观四年(630年),太宗问萧瑀: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?萧瑀回答说:隋文帝能约束自己,使自己符合礼仪,勤勤恳恳,不辞辛劳。每次坐朝理事都非常认真,有时到了太阳西斜还不休息。虽然他的品性不算仁慈明智,但也称得上是勤勉之主。太宗说:你是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隋文帝这个人的性格过于审细而不明事理。过于审细就会对人疑虑,不肯相信文武百官,结果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策处理,虽自己劳神苦形,但行事却未必都能合于情理。朝臣知道他的心意,也就不敢直言劝谏,以至宰相以下的官员,只是奉承顺旨而已。我的看法不是这样。以天下之广,四海之众,千端万绪,要使事情做得合理又通达,必须事事和百官商量,与宰相筹划。怎么能把一天要处理的许多事情都交给一人去思考决断呢?况且一天处理十件事,有五件出差错,处理得合理的当然好,那处理不当的怎么办呢?如此以日继月,乃至连年,错误岂不很多。所以,治国之道在于广泛任用贤能之士,身居高位而详察下情,法令严肃,这样谁还敢为非作歹呢?于是,太宗命令所有官署,如果皇帝颁发的诏令有不妥当或不便施行的,必须坚持己见上报,不能为顺从旨意而随即施行,必须尽到臣子的责任。

为了便于臣下的直言进谏,太宗诏令,凡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,必须使谏官随行列席,以便谏官们能对军国大政充分发表意见。同时一再下令,要求中书省、门下省坚守审议、检察的职责。贞观三年(629年),太宗批评中书、门下省的官员说:近来只觉你们阿谀奉承,顺从上情,唯唯诺诺地草率签署诏令文告,没有一句直言劝谏的话。这难道是正常的事吗?如果只是签署诏令、颁行文告,谁人不能担任?从今以后,凡皇帝颁发的命令有不稳妥、不便施行的,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,不可妄自畏惧,或明知不对也沉默不言。为了求谏,太宗还重赏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。唐太宗爱好骑射,做了皇帝之后仍然未改这一习惯。孙伏伽上书称太宗“好自走马射的以娱乐近臣,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,非今日天子事业也”。太宗见他官品低,却敢于进谏,非常高兴,立即升任他为谏议大夫。贞观初年,李大亮任凉州都督,一位由中央官署派出的官员到凉州境内,见李大亮有一只极好的猎鹰,便劝他进献给太宗。使臣走后,李大亮给太宗写信进谏说:陛下早已停止打猎了,可使者还来求鹰。如此事确是陛下之意,那是陛下违背了自己过去所立下的不再纵情打猎的意愿;如果是使者擅自求索,那是陛下用人不当。太宗阅信之后,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李大亮说:我看了你的奏章,赞许、感叹之情,久久不能抑制。有你这样的臣子,我还有什么忧虑呢!古人说,一言重于千金。你所说的话,深足宝贵。于是赏李大亮金壶瓶、金碗各一枚,又赐他《汉纪》一部,希望他勤勉阅读,为国效忠。为了鼓励臣下大胆进谏,太宗还注意改变自己的皇帝威容,放下皇帝的“架子”,每当见人奏事,“必假以颜色”,表现出亲切和蔼的神情。即使有些意见不甚妥当,太宗也“不以为忤”,“恣其陈述”,深恐以后臣下不敢直言。

贞观前期,不仅朝臣如此,长孙皇后也能像忠直净臣那样,对太宗的行为过失大胆劝谏。太宗有一匹骏马,为心爱之物,派有多年养马经验的养马人专门饲养,照料得十分周到。但有一天,这匹马突然死了。太宗迁怒于养马人,下令要杀死他。长孙皇后规劝太宗说:过去齐景公因为

爱马的死而要杀养马人,大臣晏子向齐景公说,养马人至少有三大罪过。齐景公问是哪三大罪过。晏子说:养马人的职责是养马,现在马死了,这是第一条罪过;让大王因马死而杀人,百姓知道后必然说我们国君的坏话,这是第二条罪过;事情传到诸侯那里,诸侯一定会轻视我国,这是第三条罪过。齐景公听了恍然大悟,当即赦免了养马人。陛下在书上都看到过这些事,难道忘记了?经长孙皇后的提醒,太宗认识到自己的过错,赦免了这个养马人。事后,他对房玄龄说:皇后在许多事情上都对我开诚忠告,极有好处。又有一次,太宗罢朝归来,怒气冲冲地说:我早晚要杀掉这个乡巴佬。皇后忙问这乡巴佬是谁。太宗说:就是魏徵。他总在众人面前侮辱我。皇后听了,悄悄退下。不多时,她身穿朝服出现在太宗面前,朝服是国家朝会大典才穿的盛装,太宗见了大为惊疑,皇后郑重地跪在太宗面前道贺说:臣妾听说君明臣直。魏徵忠直,正是因为君主圣明啊!听了皇后这一番规劝,太宗转怒为喜。

唐太宗自知君主不能遍知天下事,需要倾听不同的意见,虚心采纳,择善而从。由于他较为开明的作风,在贞观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言极谏的文武大臣。君主“恐人不言,导之使谏”;臣下能不顾君王颜面,敢犯逆鳞,直言极谏。其时,朝廷上下,说言直谏,蔚然成风,成为贞观政治的一大特色。

6. 贞观后期的变化

贞观后期,唐太宗在思想上逐渐表现出意骄志满的情绪,其行事也不如贞观早期那样兢兢业业、谦虚谨慎。这种变化,首先表现在纳谏方面。贞观十一年(641年),魏徵上疏说:“贞观之初,侧身励行,谦以受物。盖闻善必改,时有小过,引纳忠规,每听直言,喜形颜色。”近年来则“高谈疾邪,而喜闻顺旨之说;空论忠说,而不悦逆耳之言”。陛下听不进不同意见,大臣们也就不愿进献直言了,有的甚至献媚阿谀。贞观十三年(639年),魏徵上《十渐不克终疏》,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不能善始善终。太宗虽然接受,却没有行动。一次,太宗问魏徵:近来政事与往年相比如何?魏徵毫不隐晦地说:威德有甚于前,而臣民悦服的程度则不及以前。原因是贞观初年,陛下因国家未得治理,忧心忡忡,克勤克俭,而如今,国家已经安定,陛下懈怠之情渐起。魏徵还援引了两个不同的事例加以说明,他说:贞观初年,陛下欲杀元律师,孙伏伽因陛下惩罚太重而进谏,陛下为表彰孙伏伽的敢于直言,以兰陵公主园为赏赐。有大臣认为赏赐太厚,陛下却说,朕即位以来,未有敢直言进谏的人,所以要重赏。这是鼓励臣下直言的做法。近来,陛下要修洛阳宫,皇甫德参上书谏劝,陛下却大发脾气,说皇甫德参真是可恶之极。这是拒人进谏的做法。贞观十五年(641年)的一天,太宗又问魏徵:近来朝臣为何不谈论政事?魏徵当即回答:原因还是在陛下身上。陛下虚心纳谏,一定会有敢于进言的人。大臣们一般都是明哲保身的,他们害怕皇帝治罪,所以都不愿进言。唐太宗由早期的“恐人不言,导之使谏”到后期的“渐恶直言”,“不悦人谏”,可谓判若两人。

其二,表现在为贪图享乐而大兴土木。随着朝廷连年用兵,又营建宫室,赋税日益加重,社会矛盾有所加剧。早先,唐太宗以隋朝历史为殷鉴,常常对臣下说“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”,但后来,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,甚至认为“百姓无事则骄逸,劳役则易使”。从贞观八年(634年)起,

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下令修复洛阳宫,又接连在洛阳修飞山宫,在骊山修翠微宫,在宜春修玉华宫,在汝州修襄城宫。这些离宫别馆规模宏伟,建筑豪华。如作为唐太宗避暑和休养胜地的玉华宫,就建有玉华殿、排云殿、庆云殿、晖和殿、紫微殿等建筑,营建的费用巨大。贞观末期,又连年对边地用兵,西击龟兹,东击高丽。为准备对辽东的战争,大量征发江南、剑南民工造船,又强迫百姓缴纳船庸,百姓卖房鬻子都难以供给,最终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。

魏徵、马周、房玄龄、李靖等一批贞观重臣相继去世,预示着号为“治世”的贞观时代即将落下帷幕。贞观二十一年(647年),太宗又得风疾,瘫痪在床。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《帝范》12篇,反省自己所做的错事,要他以贤哲为师,不要效法自己。贞观二十三年(649年)三月,年仅50岁的唐太宗终因误食金石而过早地结束了生命。

7. 唐太宗画像

这幅唐太宗画像为绢本设色画轴,纵271厘米,横126.8厘米,现收藏于“台北故宫博物院”。此像属南薰殿旧藏历代帝王图像中的一幅。故宫南薰殿始建于明,位于武英殿南面。清乾隆十四年(1749年),清高宗检阅库中文物,发现所藏画像多斑驳脱落,乃命工部将内府所藏的历代帝王后妃、圣贤名臣肖像重新装裱。其中帝后像用黄表朱里,臣工像则用朱表青里,以此区分尊卑不同。竣工后,清高宗下令将这些图像改贮于南薰殿中,由内务府管理,还亲撰《南薰殿奉藏图像记》以志其事。这批图像改贮南薰殿后,也被称作“南薰殿图像”。嘉庆二十年(1815年),清仁宗下令将南薰殿图像收入《石渠宝笈三编》。受命编纂的胡敬又另编《南薰殿图像考》两卷,对这批画像的流传渊源、收存考订以及画中人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记述。

南薰殿图像历经宋、元、明三代累积而成,其中的历代帝王后妃和圣贤名臣像或为原本写真,或为临摹本,或为后世臆想之作,可以肯定大多出自宫廷画院画师之手,但画像上大多不落名款,因此作者究竟是谁难以考证。

此图所绘唐太宗李世民,头戴乌纱帽(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记载:“乌纱帽者,视事及燕见宾客之服也。”),方圆脸,两眼向前平视,八字胡,神情庄重而安详,英爽之气逼人,身着黄色龙袍,双手握腰带而立。画像当是根据唐朝的母本,由宋代画工摹绘的,也可能明代又重摹过。其表现技法为用细劲线条先勾画轮廓,然后着色。眉毛、胡须都一笔一笔画出,衣纹线条简练,龙纹描绘极为工细,有丝绸刺绣的质感。整体非常统一,大致还可以看出唐代肖像画的特点。

唐代国势兴盛,艺术成就百花齐放,肖像画继承前代,又有很大发展。将此像与现存的唐代肖像画原迹(如今存日本京都护国寺的《不空像》等)进行比较,可以看出作者重视东晋以来特别注重“传神”的优良传统,表现眼神及内心活动的刻画比较含蓄。着色则是在平涂的基础上,再加渲染,脸上的层次比较丰富,形象颇为准确。此像当属古代肖像画形神兼备的典范作品。

8. 武则天

武则天,并州文水(今山西文水东)人。武则天原先叫什么名字,史书记载不详,登帝位后自

改名为曌,叫武曌,则天是她死后的谥号。后人一般称她为武则天。她的父亲以贩卖木材为业,是个富有的商人。隋末时武氏与李渊有交往,李渊晋阳起兵后,武氏曾资助过钱财粮草。唐建立后,武氏作为“元从功臣”,历任工部尚书、荆州都督,封应国公。母杨氏,为隋室疏宗。

武则天14岁时被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中为才人,入宫前她向母亲告别说:侍奉天子,岂知非福,为何还要哭哭啼啼如儿女状?一日,她得知唐太宗有一匹名叫狮子骢的烈马无人能驯服,便自告奋勇对太宗说:妾能制服陛下的这匹烈马,但须三件东西。太宗问她是哪三件东西。她说:我要一条铁鞭、一把铁锤、一支匕首。马不听话,就用铁鞭抽它;再不听话,就用铁锤击它;还不听话,就用匕首刺它。太宗对她的方法颇为欣赏。太宗死后,武则天入感业寺为尼。

唐高宗李治为太子时,便对武则天有爱慕之情。永徽五年(650年),继位后的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,复与武则天相遇,遂召其入宫中,拜为昭仪。入宫后的武则天与王皇后、萧淑妃争宠,互相谗毁。永徽六年(655年),高宗欲废王氏改立武氏为皇后,元老重臣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韩瑗等人以武氏非名门出身而表示反对。许敬宗、李义府等人投高宗所好,大力支持,李绩则对高宗说:“此陛下家事,何必更问外人。”高宗乃立武氏为皇后。王皇后、萧淑妃随后即被武则天害死。

高宗晚年体弱多病,武则天乘此机会遂专国柄,威势日重。显庆四年(659年),她将长孙无忌、韩瑗等人削职免官,并逐出京城。此后,凡反对她的朝廷官员,均被贬杀殆尽。上元元年(674年),高宗称“天皇”,武后称“天后”,宫中有“二圣”。弘道元年(683年)高宗去世,中宗李显继位,武则天临朝称制。次年(684年)二月,武则天又废中宗为庐陵王,另立第四子李旦为帝,是为睿宗,自己仍临朝称制。武氏取而代之的趋势日益显露,李绩之孙徐敬业(李绩原姓徐,唐朝赐姓李)兄弟等以扶持庐陵王为号召,在扬州起兵反武,但很快便告失败。不久,又有越王李贞、琅琊王李冲代表宗室势力起兵反武,也告失败。天授元年(690年),武则天将睿宗降为皇嗣,自己称帝,改国号为周,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

武则天为夺取政权,不惜大肆剪除异己,打击政敌。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于志宁、裴炎、程务挺等,或被贬逐,或遭诛杀。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也相继遭杀戮殆尽。执政后,武氏因疑心朝臣不忠,遂任用索元礼、周兴、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,严刑逼供,奖励告密,以此来消灭政敌,其中不乏滥杀无辜的事例。直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,斗争才趋向缓和,滥杀无辜的风气才有所收敛。

武则天生性倔强,深谙政事,多年侍奉太宗,对“贞观之治”有深刻的印象。在她执政的年代里,贞观年代的政策得到延续和发展。第一,重视发展农业生产,推行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政策。她曾规定地方官员,凡是所在州县耕田增加、家有余粮的,即可升官,反之就要受罚。她还命令臣下编了一本名为《兆人本业》的农书,颁行天下。第二,广开言路,注意纳谏。高宗时,武则天曾上疏建言十二事,诸如劝农桑、薄赋敛、息干戈、禁淫巧、省力役等主张,高宗皆略有采用。武则天执政以后,广开言路,勇于纳谏,谏诤官员中有直言不讳、触犯隐私,甚至劝她退位者,她都能大度包容,有的还受到赏赐。第三,整顿吏治,严惩贪官。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的政策,派遣使者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,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,不论地位高低,一律严惩不贷。第四,发展科举制,打击旧门阀士族。武则天继续发展科举制,举行殿试,创立武举、自举、试官等制度,又有员外

置官,颇能破格用人,广泛罗致人才。同时,为了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,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,改《贞观氏族志》为《姓氏录》,把武家列入第一等,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于谱。第五,开发边疆,巩固边防,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。武周时期,政府感到整个西域过于阔远而难以管辖,于长安二年(702年)另置北庭都护府(治庭州,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),管辖天山以北的地区。安西四镇(时为碎叶、龟兹、于阗、疏勒)自垂拱二年(686年)起为吐蕃所占,长寿元年(692年),武则天不甘心失土,派遣王孝杰等击破吐蕃,恢复安西四镇。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中,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作用及唐太宗“贞观之治”奠定的基础,也由于武则天沉重打击了旧士族和大贵族、大官僚集团,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,社会经济呈现出发展的趋势,人口也由380万户猛增到615万户。

但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。她崇佛教、建寺院、筑明堂、造天枢、铸九鼎,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;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。她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、武三思等人,大封武氏宗人为王,晚年又宠爱男妾张昌宗、张易之兄弟,遂使政治更趋腐败。神龙元年(705年)正月,张柬之等联合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,诛杀二张,逼则天退位,迎中宗复位。同年十一月,武则天去世,死后与高宗合葬乾陵。

9. “开元盛世”

唐朝自武则天退位以后,经历了唐中宗、唐睿宗两朝,其间朝廷政局极不稳定,接连发生政变。先是在长安四年(705年)正月,武则天病重,宰相张柬之等文武大臣率兵进宫,杀武氏男妾张昌宗、张易之,拥立唐中宗复位,取消武周国号。同年冬,武则天病死。然中宗庸懦无能,即位后专信韦皇后,武氏余党武三思、韦皇后女儿安乐公主、武后女儿太平公主把持朝政,朝廷要职均为武三思党羽所占据,武氏势力东山再起。皇太子李重俊约集羽林大将军等矫诏杀武三思集团,太子又被韦皇后杀害。于是,朝廷大权落于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手中,两人合谋杀中宗,准备拥韦氏登基。李旦之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,杀韦后、安乐公主以及其他党羽。随后,由李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出面,拥立睿宗李旦。

睿宗即位以后,朝廷大权实由太平公主所控制,甚至朝廷大臣奏事也都要先通过她。她援引私党,日益专横,而且策划谋害太子,自己篡位。延和元年(712年),睿宗让位于李隆基,是为唐玄宗。次年,(713年),玄宗杀太平公主亲信宰相窦怀贞等,太平公主也被赐死于家中。至此,自武则天退位以后的政局动荡才告结束。

唐玄宗即位以后,改年号为开元,为了稳定政局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第一,把武、韦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,把武则天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(非正式任命),以及试、摄、判、知官(非正职的冗官)予以裁撤精简,将宰相员额由睿宗时的十余人减少到两三人,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。第二,用恩礼优待自己的同胞兄弟,却不给他们以实职,从而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。第三,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(如刘幽求、钟绍京、王琚等)坚决予以贬斥。第四,对有才干的宰相任用不疑。开元初以姚崇为相,他帮助玄宗执行上述三项政策,又沙汰僧尼,整顿吏治,对安定政局起了很大作用。姚崇之后,所用宋璟、张说、韩

休、张九龄等，皆为名相，政治上均有所建树，而且都能直言极谏，玄宗也能听取意见。第五，改善吏治。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，以厉行法治和严明惩罚作为改善吏治的根本措施。

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，于是生产发展，经济繁荣。开元时期，土地开辟，史称不少地区“高山绝壑，耒耜亦满”。据杜佑《通典》所记：“至(开元)十三年封泰山，米斗至十三文，青齐谷斗至五文。自后天下无贵物，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，面三十二文，绢一匹二百一十文。东至宋(今河南商丘南)、汴(今河南开封)，西至岐州(今陕西凤翔)，夹路列店肆待客，酒馔丰溢。每店皆有驴赁客乘，倏忽数十里，谓之驿驴。南诣荆(今湖北江陵)、襄(今湖北襄阳)，北至太原、范阳(今北京)，西至蜀川(今四川成都)、凉府(即凉州，今甘肃武威)，皆有店肆，以供商旅，远适数千里，不持寸刃。”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，物价低廉，商业繁茂，道路畅通，行旅安全。诗人杜甫的《忆昔》诗，描写的就是开元年间社会安定、经济富庶的情况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时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狼，远行不劳吉日出。齐纨鲁缟车班班，男耕女桑不相失。”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。著名诗人高适、岑参、王维，特别是李白、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(所谓大历十才子)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。其他音乐、绘画、雕刻、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成就显著。

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。自唐高宗以后，吐蕃、后突厥、契丹相继成为唐朝西方、北方的严重威胁。许多原先已归属唐朝的地区又脱离控制。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，开立屯田，充实防务，又从东北到西北设立节度使，在南方设岭南五府经略使，以统一军事指挥。开元五年(717年)，唐军收复陷于契丹二十一年之久的辽西十二州，于柳城(今辽宁朝阳)重置营州都督府。后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。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，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。在陇右、河西之西增置军镇，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，保证了中国和中亚、西亚的交通顺畅。

玄宗开元年间，政局稳定，经济繁荣，文化昌盛，国力富强，王朝声威远播，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。以唐王朝近百年的发展为基础，到玄宗开元年间，帝国发展达到了极盛，被史家誉为“开元盛世”。但在繁荣强盛的背面隐藏着危机，玄宗至开元后期，宠信奸臣、宦官，自己纵情声色，追求享受，朝廷政事逐渐败坏。社会的危机则急速发展，土地兼并激烈，大量农民逃亡，均田制、府兵制和租庸调制都濒临崩溃，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，导致内轻外重，成为后来“安史之乱”的原因。

10. 韩休

韩休(673—740年)，雍州长安(今陕西西安)人。擅长文辞，应制举及第，走上仕途。唐玄宗当太子时，曾在东宫向韩休等人询问治国方略，韩休所呈对策颇受玄宗赏识，擢任左补阙，后历任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，兼知制诰。开元二十一年(733年)，任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成为宰相。韩休生性方正耿直，从不阿谀奉承，因而在朝廷内外极有声望。为相期间，他直言极谏，据理力争，竭力纠正玄宗的过失。即便玄宗已下达指令，只要其事不合法规与情理，韩休仍尽力抗争，甚至拒不执行。当时，京兆地区的万年县尉李美玉犯下一项小罪，玄宗下令将他流放岭南，与

此同时,任左金吾大将军的程伯献(唐初功臣程咬金的孙子)贪赃枉法,玄宗却不闻不问。于是,韩休向玄宗提出异议称:县尉李美玉只是一名小官,所犯亦非大罪,为何受到如此重罚?而朝廷现有大臣犯下大奸大恶,臣下请求首先处治大臣。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倚仗朝廷的恩宠而贪赃枉法,住宅、车马等都有僭越,臣下请求先治罪程伯献,然后再处罚李美玉。玄宗不答应。韩休毫不退让,继续抗争说:细小之失不能宽容,而巨猾大罪却置之不问,陛下若不处罚程伯献,臣下不能奉诏流放李美玉。最终,玄宗的指令未能执行。此类君臣之争在韩休为相期间经常发生,玄宗往往无可奈何。教材中所举事例,见于《新唐书·韩休传》的记载:“休峭鲠,时政得失,言之未尝不尽。帝尝猎苑中,或大张乐,稍过差,必视左右曰:‘韩休知否?’已而疏辄至。尝引鉴,默不乐。左右曰:‘自韩休入朝,陛下无一日欢,何自戚戚,不逐去之?’帝曰:‘吾虽瘠,天下肥矣。且萧嵩(前宰相)每启事,必顺旨,我退而思天下,不安寝。韩休敷陈治道,多讦直,我退而思天下,寝必安。吾用休,社稷计耳。’”

11. 唐代疆域

唐是继汉之后的又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,开元、天宝之际,帝国版图达到极盛:东至安东,西至安西,南至日南,北至单于府。

东陲边疆:唐朝在高宗总章元年(669年)设安东都护府,治所在平壤,统高丽、靺鞨诸部族府州,辖境西起辽水,南及今朝鲜北部,东与北抵海,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抵海口之地。其后,大同江中、下游两岸渐为新罗所有;今辽宁昌图、新宾、宽甸以东包括吉林、黑龙江的松花江、牡丹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渤海国占据;黑龙江下游直抵海口的地区为黑水靺鞨所有。这样,至玄宗开元二年(714年),安东都护府的治所移置于平州(今河北卢龙),天宝二年(743年),再移至辽西郡故城(今辽宁义县东南)。总之,东陲边疆初时虽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,但其地当时并未完全平定,仍有军事行动,致使平壤城残破。开元、天宝之际,安东都护府一再迁移,其治所大体仍在辽河以西,说明朝廷对辽河以东业已不闻不问了。虽然唐与汉代一样,安东都护府的治所设在平壤(汉代乐浪郡的治所也设在平壤),而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仍有“南北如汉之盛,东不及而西过之”之说。

西陲边疆:唐初的西陲边疆大体沿袭隋朝,仅至于伊吾(今新疆哈密)和且末。贞观十四年(640年)唐灭高昌国,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(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址),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。贞观二十年(647年),西突厥请和亲,唐使其割属下龟兹、于阗、疏勒、朱俱婆、葱岭五国作为聘礼。贞观二十二年(649年),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,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(今新疆库车),统辖龟兹、焉耆(今新疆焉耆西南)、于阗(今新疆和田西南)、疏勒(今新疆喀什)四镇,简称“安西四镇”。四镇虽为羁縻州府,但因地处边防,为军事重镇,故与一般羁縻州不同,在龟兹、焉耆、于阗、疏勒四城修筑有城堡,建置有军镇。贞观以后,安西四镇时置时罢,军镇也有所变动。武后长寿元年(692年),唐朝击破吐蕃,收复四镇,并遣军2万多人常驻四镇,从此安西四镇的形势才稳定下来。其时,安西都护府所统的各羁縻州,其西陲远达今伊朗东部的托博勒(安西都护府下属的波斯都督府是当时所置的最远的一所,其治所在疾陵城故地,即今伊朗的托博勒),

这是唐代声威在西陲所达到的最远之处。“安史之乱”后,安西、北庭以及河西、陇右驻军大部内调,吐蕃乘虚陆续占领陇右、河西诸州,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,然四镇留守军队仍坚守各镇。至贞元年间,安西四镇相继陷于吐蕃。9世纪中叶回鹘相继据有天山南北及安西四镇,唐的西域仅及凉州而已。

南陲边疆:唐朝的南疆到达日南县,日南属爱州,其地在今越南清化县北。在爱州之南,尚有欢、林诸州,可见唐时的南界当不止于日南县。唐朝西南的疆域以隋朝旧疆为基础而有所变动,隋朝在今云南曲靖设有南宁州,在今云南昆明设有昆州,这两州均以土民为刺史,可谓开唐代羁縻州之先河。唐朝在戎州(治所在今四川宜宾)、嵩州(治所在今四川西昌)之南,设姚州(治所在今云南姚安),戎、嵩、姚三州之下,各领有若干羁縻州。其时,唐在西南的边界可达到今云南保山、双柏、蒙自等地。唐朝中叶以后,因南诏的崛起,西南疆界有所收缩,至9世纪初,唐朝在西南的版图大约仅到大渡河为止。

唐朝在北疆设单于都护府,开元、天宝之际,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。其后,单于都护府与安北都护府屡有分合,天宝以后,单于都护府再与安北都护府合并,以安北为号。安北都护府所统辖的羁縻州,最远可达坚昆和幽陵两都督府。坚昆地处今俄罗斯境内的叶尼塞河上游,幽陵地处今石勒喀河的上游鄂嫩河地区。唐北陲的边疆远超过秦汉时代。

12. “思考与讨论”参考资料

贞观年间,唐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难易问题。贞观十年(636年)的一天,他问房玄龄、魏徵等人:帝王的事业,创业与守成哪一个更艰难?房玄龄回答说:天下大乱时,各路群雄四起,攻城略地,战争激烈,这样说来,创业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。魏徵不同意这样的看法,他说:君主起兵打天下,必定是世道衰败的时候,在混乱中歼灭那些昏乱暴虐的人,容易获得百姓的拥护,天下的人也都会来归附,因此,创业并不太难。然而,得到天下以后,容易骄傲自满,享乐腐化。百姓希望休养生息,你却徭役征发不断;百姓已经穷困疲惫,你却奢侈享乐一刻不停。国家的衰败,正是由此开始的。以此而论,守成更加艰难。太宗说:房玄龄过去跟着我打天下,饱尝了创业的艰难困苦,出生入死,所以看到创业的艰难。魏徵和我一起安定天下,担心骄奢淫逸的出现导致败亡,所以看到的是守成的艰巨。现在创业的艰辛已经过去,守住已经建立的功业的困难,我应当考虑与你们一起谨慎地对待。(《贞观政要·论君道》)

贞观十一年(637年),魏徵向太宗上了一道奏章,其中又说到创业与守成的难易问题。魏徵说:许多国君,秉承上天的使命,开创基业的时候,没有哪一个不是深切忧虑、谨慎行事的。而大功告成之后,其德行就开始出现问题了。有好的开端的确实很多,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很少。这岂不是说明了取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?过去夺取天下时,力量有余;如今要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。这里的原因在哪里呢?创业时君王处在深切的忧患之中,必然是竭尽诚意来待人。一旦成功,就会放纵情欲,傲视他人。当竭尽诚意来待人的时候,即使疏远如北方的胡人与南方的越人,也会亲密得像一个整体;当傲视他人的时候,即使是骨肉兄弟,也会疏远得像陌生的路人。虽然有严厉的刑罚来督察,有威严来震慑,但人们总是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。怨恨不在于大

小,可怕的是人心的向背。水能载船也能翻船,正是应该小心谨慎的啊!以已经腐朽的绳索去拉飞奔的马车,这样的危险岂能忽视?

贞观十五年(641年),太宗又问近臣:守天下是难是易?魏徵仍然回答说:很难!太宗说:任用贤人,采纳臣下的意见,不就可以了么?怎么说很难呢?魏徵说: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,当他们处在忧患危机之时,都能够任贤纳谏;但等到安乐以后,便有些懈怠了,对奏事的臣下,只准他们战战兢兢、谨慎畏惧地说话,这样,时间一久,国家就会败亡。古代圣人之所以要居安思危,正是这个道理啊!居安而能怀畏惧之心,这难道不是很难吗?

八、研究动态

关于武则天的评价

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,参政、主政达50多年,对唐代前期历史影响巨大。唐宋以来的旧史家对武则天褒贬不一。新中国成立后,史学界关于武则天的评价也有很大争论,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观点。

(1) 否定说。20世纪50年代,隋唐史专家岑仲勉认为:“近人对武则天有怨辞,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,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。突厥横行北地,吐蕃跳梁于西陲,对外族浸凌,全无对策。而又居心疑忌,秉性残酷,俊臣、周兴之流,乘时出现。”“彼所有宰相,绝无表现者四分之一,无一长可取者数亦不少。”“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,构天堂则日役万人,采木江岭,所费万亿,怀义用财如粪土,一无所问,铸九鼎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,凡此兴建,不知民生国计,有无丝毫裨益。”1979年,熊德基在《论武则天》一书中也认为:“武则天及其建立的集团也只是唐初士族地主阶级中腐朽势力的代表。”“她之所以能登上‘女皇’宝座,第一,主要由于她利用士族地主阶级为她的社会基础;第二,是她利用宫廷中的地位,逐渐建立了一个‘宫廷奸党’——‘后党’。”“她一贯用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。”“奖励告密,多用特务,以严刑峻法进行大规模的屠杀,实行血腥的恐怖政策。”“在她做‘女皇’的年代里,佛教大大发展,她亲令建佛寺,造佛像,各寺院的僧侣地主也大肆搜刮。人民没有在龙华会上得到超度,却饱受了她所赐予的人间的苦难。”熊氏认为,武则天实行的“革新措施”是“许多反常的措施”,后果十分严重。最明显的是: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,造成人民大量流亡;“均田制”的加速破坏,致使官僚、地主、寺院兼并日烈;贪污浪费严重,人民流亡,造成财政危机;府兵制的加速破坏。熊氏的结论是:武则天及宫廷奸党统治的这50多年中,“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以及社会风气,显然都呈现了全面的倒退。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逆转”。

(2) 基本肯定说。史学界持此说者较为普遍,如20世纪50年代初,罗元贞在《武则天批判》一文中认为:“武则天和其他的男皇帝一样,是一个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,是人民的统治者、剥削者、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。”“她这五十年间,有过好些反动措施,于人民不利,对社会经济亦有浪费与破坏的作用。”但另一方面,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积极的作用:“第一,初年和晚年,对外抵抗了突厥、吐蕃的侵略及契丹的进扰;第二,内政并不黑暗,具有新政策,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方面,都有很大的作用。”“武则天的政治不是婆婆妈妈或胡作妄为的。是许多男性封建君主所

不如的。”“武则天发展了科举制度，敞开了中间地主阶级参政的大门，充实了当时的政治力量，促进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确立。”“打破重视贵族门阀的旧例，尽量引用‘平民’（主要是没有政治地位的中小地主阶级），促使中国政治往前发展一步，国家增加了新的力量。”罗氏的结论是：“武则天是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，她执政时期有过好些反动措施，但她对外屡次抵抗了外敌，客观上保卫了国家与人民，对内扶植了一般地主阶级，促进了新的地主阶级的发展，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。因此，两相比较起来，武则天在历史上，还是积极方面的作用大。”20世纪60年代初，汪篪的《武则天》一文也认为，对武则天“可以肯定的有两点：第一，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，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、豪强地主；第二，基本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、佃客制，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”。汪氏的结论是：“武则天是应当基本上加以肯定的人物，因为她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，对扫除旧势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。”20世纪80年代，郑宝琦在《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》一文中分析了武则天功过得失后认为：“我们既不同意将武则天一棍子打死的全面否定的观点，也不同意说武则天是站在‘爱百姓’的立场而进行改革的过高评价，而是认为应该给予其肯定和一定的历史地位。”

(3) 充分肯定说。郭沫若认为：“武后在生产上重视农桑，在她执掌政权的50多年间，她使天下富庶了。”“武后末年的中国户口比起唐太宗末年来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。”“事实上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，不仅海内富庶，政权的范围更远远达到了波斯湾。她把唐太宗的‘贞观之治’发展了，并为唐玄宗的所谓‘开元盛世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”1987年，刘希为用比较史学的方法研究武则天，在《关于武则天的比较研究》一文中，刘氏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：第一，把武则天和世界中世纪时期所有的女皇进行对比研究；第二，把武则天和吕后、冯太后、慈禧太后进行对比研究；第三，把武则天和唐高宗、中宗、睿宗进行对比研究。刘氏的结论是：武则天“可以和唐代前期的唐太宗、唐玄宗相媲美，她不愧为世界世纪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”。

综上所述，有关武则天的评价分歧颇大，除认识方面的因素外，与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。近年来的有关论著对武则天的研究和评价趋向于剖析具体问题，更注重理性、客观的分析。

九、参考书目

1. 吕思勉著：《隋唐五代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版。
2. 王仲荦著：《隋唐五代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版。
3. 陈寅恪著：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版。
4. [唐]吴兢著：《贞观政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版。
5. 张国刚主编：《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》，天津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6. 刘炜主编：《中华文明传真》第六册《隋唐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、香港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版。
7. 刘善龄等著：《话说中国·大唐气象》（隋唐）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04年版。